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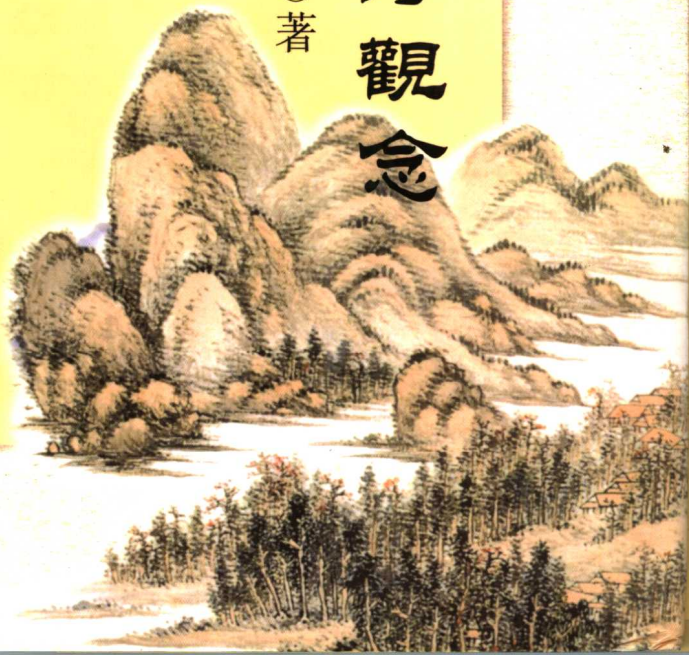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中國詩性文化與詩觀念

王南◎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I207.22
W235

中國詩性文化與詩觀念

王南◎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詩性文化與詩觀念/王南著.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7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項楚主編)
ISBN 7-5409-2653-8

I. 中... II. 王... III. 詩歌-文學理論-文學研究-中國 IV. 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58193 號

策劃制作:四川新華出版公司

總發行人:王慶

總策劃人:陳大利

總監制人:文龍

責任編輯:陳華

封面設計:文小牛

中國詩性文化與詩觀念

王南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鹽道街3號 郵編610012)

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經銷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

成都武侯區機投鎮潮音工業小區(028)87445573

開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張 10.5 字數 240 千

2002年7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册

ISBN 7-5409-2653-8/1·416

定價:26.50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編委會

學術顧問：楊明照

主 編：項 楚

編 委：周裕鍇 謝 謙 張志烈

曹順慶 馮憲光 周嘯天

劉亞丁 陳大利

常務編委：張志烈 周裕鍇

秘 書：楊文全

序

蔡鍾翔

我與王南相識交往十餘年，對於他從碩士到博士的求學歷程是有所瞭解的。他給我的印象是，治學嚴謹，厚積薄發，不追求數量，而重視深度，不人云亦云，而潛心于獨立思考，這與當今有些學人粗製濫造、摻水剽襲、搞“泡沫學術”之風相比，誠屬可貴。他在職攻讀博士學位，不脫離教學工作，我知道這是相當艱辛的，又逢家中老母患病，其困難可以想見。及至看到他的博士論文，祇是題目便吸引了我的注意，“中國詩性文化與詩觀念”，這個選題新穎大氣，但難度是很高的，我很佩服王南這種敢于啃硬骨頭的精神。

王南寫這篇論文的目的是為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的重建提供可資參考的觀念材料，立意很具現實意義。然而要論證中國傳統文化為詩性文化的判斷，并在這個大文化背景下作出中國獨特的詩觀念的理論內涵的概括，又談何容易！讀竟全篇之後，我不由得贊嘆這是一篇出色的學術論文，作者居然舉重若輕地較完滿地解決了這些難題。突出的感受是通篇充溢着透出才氣的獨創性。首先，引入西方的“詩性”概念來說明中國文化的特徵，從詩性文化的角度揭示中國詩觀念的本質，就是一種創發。其次，研究采

取的視角、思路、方法都有別出心裁之處。例如從文化的特性因素與詩觀念的成因入手，將中國文化的詩性意義與中國詩學中的詩觀念表述置于互為闡發的關係之中，使歷來作為文學理論研究的難點的詩本體問題得到一個文化內涵與文學特質的說明。由於作者知識積纍厚實，佔有大量的文獻資料，並能夠融會貫通，一些獨到的見解的提出都有充分的把握和堅實的依據，如上篇階段論展示中國詩觀念從生成到成熟的歷史過程，下篇觀念論概括詩學體系中四大範疇的系統配置和四種詩觀念的基本表述模式，均為發前人所未發，而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此外，論文也注意到了文學創作實例的引證和解析，能與文學史相溝通發明。語言表達既有邏輯性、條理性，又有一定的文采，靈動流暢，而無學術論文中常見的板滯沉悶之病，也是值得贊揚的。當然我並非認為論文已臻完美，如下篇還顯得比較單薄。

現在論文內容又加充實修訂將作為專著出版，我理應為王南致賀，他邀我作序，祇得將一點讀後感拉雜寫出聊以塞責，是為序。

2002年1月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 宋詩體派論 呂肖英◇著

◎ 梁啓超文論的現代性闡釋 楊曉明◇著

◎ 從經學到美學：中國近代文論知識話語的嬗變 馬睿◇著

◎ 唐代小說觀念與小說興起研究 韓雲波◇著

◎ 中國詩性文化與詩觀念 王南◇著

◎ 龐居士研究 譚偉◇著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目 錄

緒 論	(1)
第一節 無解的詩問	(1)
第二節 無定的詩質	(9)
第三節 無盡的詩性	(16)
上篇 階段論	(24)
第一章 文化中的詩性——中國詩性文化的原初表現	(24)
第一節 詩性生成	(24)
第二節 文化觀念中的詩性	(35)
第二章 詩性存活——先秦詩性文化的奠基	(46)
第一節 詩性價值觀	(46)
一、“利”的超越	(47)
二、“情”的體驗	(50)
三、“游”的心態	(57)
四、“述古”的價值取嚮	(62)
第二節 詩性言意觀	(66)
一、“言，身之文也”	(67)

二、“無言而心說”	(71)
第三章 詩性觀念化——兩漢的詩性觀念表述	(87)
第一節 兩漢《詩》學的詩性悖論	(87)
第二節 “抒中情而屬詩”	(97)
第三節 “詩無達詁”	(109)
第四章 詩性純化——魏晉六朝詩性的文學觀念化	(119)
第一節 “任情”的詩性	(120)
一、生命意識的詩性	(120)
二、詩觀念的過濾	(129)
三、“緣情而綺靡”的詩本體意義	(140)
第二節 “放蕩”的詩性	(147)
一、從“言志”、“緣情”到“情靈搖蕩”	(147)
二、“放蕩”詩論的文化溯源	(153)
三、“放蕩”為詩的觀念價值	(158)
第五章 詩觀念系統化	(165)
第一節 “氣高出于天縱”——詩性張揚的時代	(165)
一、“天生我材必有用”——文人心態的詩性	(166)
二、“將以不可求之事求之”——宗教觀的詩化	(174)
第二節 “文質半取，風騷兩挾”——文化觀開放的詩性	(184)
意義	(184)
第三節 “至苦而無迹”——創作觀成熟的詩本體意義	(199)
第四節 系統的詩觀念	(208)
一、範疇的確立	(208)

二、表述的深化·····	(216)
下篇 觀念論·····	(219)
第一章 本體論和詩觀念·····	(219)
第一節 哲學本體論的詩性·····	(219)
第二節 人性與詩性·····	(226)
一、人論的詩性意義·····	(226)
二、“詩與人爲一”·····	(240)
第三節 詩趣與詩境·····	(257)
一、人生情趣的詩性·····	(257)
二、人生境界與詩境·····	(263)
第二章 詩觀念表述模式體系論·····	(271)
第一節 泛言之“詩”·····	(272)
第二節 對比見“詩”·····	(277)
第三節 以“思”見“詩”·····	(290)
第四節 以“象”見“詩”·····	(297)
第三章 結語：不可言說的審美感情·····	(304)
第一節 中國詩性的回歸·····	(304)
第二節 中國詩觀念的本質·····	(307)
第三節 “不可言說”的言說·····	(313)
主要參考書目·····	(317)
後 記·····	(325)

緒論：詩性論的價值

本書的寫作，擬從文化成因的角度入手，研究中國文學理論中的詩觀念的生成、發展和表述方式，顯示其文化內涵和文學特質，以期使歷來聚訟紛紜的詩歌藝術的本體特徵得到一次盡可能明確的中國式說明，為中國文學理論體系的重建以及與外國詩學的交流提供可用的觀念材料。

第一節 無解的詩問

仿佛存在一個關於詩的“情結”。提筆之時無論怎樣另闢蹊徑，似乎總也繞不開“詩是什麼”這個問句。稱之為“情結”，是因為與詩的藝術特點相關，筆者在思考這一問題時首先引發的往往不是理論性的思辨，而是在古代詩歌動人心魄的奇詞妙句和發人深省的論詩妙語的引導下自動陷入情感性的困惑之中。

詩為何物？詩的本質特性何在？世界文學理論與中國文學理論的發展歷史告訴我們：若要對“文學”這一文化現象作出“通識”的解釋或是對某一民族文學的特性進行盡可能充分的說明，詩問不可迴避。

作為集中體現文學的藝術本質的詩歌文體，其本質特徵的觀念化既是文學理論史的第一個實例，也是文學本體論闡釋的第一個步驟。在西方文學理論中，研究的發展一直伴隨着對於詩性的執著叩問。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就已通過與歷史著作的比較論述廣義的“詩”在合于規律的虛構和揭示生活的普遍意義方面的特徵。他深刻地指出“詩”與歷史的區別并不在於是否用韻文，實際上已經提出了詩的本質標準問題了。賀拉斯的《詩藝》是西方古典主義詩論的奠基之作，其中首次論述了詩的句式與情感內涵相匹配的“詩格”問題，並提出詩必須做到除了修辭美之外的以情動人。古希臘、羅馬詩論所呈現的關注點和深度不僅預示着西方詩學的前景，也預示了“在一切藝術裏詩的藝術佔着最高的等級”^① 成為西方文學理論中的一個經典觀念。“詩學”在西方成為文學理論或文藝學的通稱，正說明詩性問題不僅是文學研究的起點問題，也始終存在于文學、藝術的各個領域和時期。卡斯特爾維特羅《亞里士多德〈詩學〉的詮釋》^② 明確指出詩的根本特徵不在格律而在想象和創造，並且將“歷史的”與“科學技術的”這兩類以客觀真實為基礎的內容從詩中劃分出去。錫德尼指出，“詩的”作為修飾語，其含義除了音樂、戲劇的特徵外，還包含着“無法形容的、永恒的、祇是為信仰所澄清了的目光纔見得到的美底熱情”，詩是“體現詩意的創造”^③。同亞里士多德、卡斯特爾維特羅等一樣，錫德尼也敏銳地意識到詩性存在于形式

① 康德《判斷力批判》，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上卷，第173頁。

② 轉引自張秉真、章安祺、楊慧林著《西方文藝理論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145頁。

③ 《為詩辯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7—8頁，第14頁。

之外，“有節奏的稱為詩行的寫作形式”“祇是詩的裝飾而非詩的成因”，他將詩人創作的標志定為“怡悅性情的，有教育意義的美德、罪惡或其他等等的卓越形象的虛構”^①，將通過“安排在令人喜悅的勻稱裏”的語言傳達的詩中的學問與“用晦澀的定義開始的”、“使記憶上負擔起疑問的重負”的學問相區別等等^②，已經可以說是相當精闢的“詩性論”了。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理論的代表人物華茲華斯、柯勒律治、雪萊、濟慈等憑借詩人的心靈感受詳細討論詩的情感和語言，使詩的本質特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正面闡發，也為其後的象徵主義詩學建立了基本的參照物。不論是泛指的“詩”、特指的“詩”還是以特指代表泛指的“詩”，現代文論家仍無法放棄“詩”的追問。叔本華用“詩人的心靈用以把握理念的明確性和生動性”、“抓住一瞬間的心境而以歌詞體現”等概括文學藝術的特點^③，榮格用詩歌作為“神話”、“原型”理論的典範文體；瓦雷里探討“純詩”的標準，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等人標舉“藝術性”、“陌生化”來揭示詩的內部規律，龐德的詩歌“意象”論、艾略特的“非個性化”詩論，瑞恰慈的詩歌“語義”論等等，法國象徵主義、俄國形式主義和“新批評”等構成西方現代文學理論主體的重要理論流派無不體現為對詩性鍥而不捨的追問。海德格爾的哲學著作能夠重新喚起文學理論界的熱切關注，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在人們模糊地意識到“思的詩性依然被/嚴嚴遮蓋”^④之時從人類存在的角

① 《為詩辯護》第14頁。

② 同上，第30、31頁。

③ 《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336、345頁。

④ 海德格爾：《詩·言·思》，轉引自《人，詩意地安居》，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頁。

度說明詩的價值，清醒地向純粹的詩性回歸。詩性的辨析，詩本質的界定，從狹義之“詩”到廣義之“詩”的藝術理論體系的創建與更新，同樣也是印度文論等東方文學理論的基本內容。除了大量從修辭角度討論詩特徵的論述外，印度文論中“詩是音和義的結合”（《詩莊嚴論》）、“詩的靈魂是韻”（《韻光》）^① 這類的詩本體論正體現了詩問的深入。

“詩國”——中國的情況更是如此，詩問代代相續，構成了中國文論中最富於文學價值的內容。建立中國的文學理論體系，應當以中國傳統文論中的文學本體論為觀念定性的首選研究材料，而詩論是中國文論的主體，詩本體論又是最富於中國特色的理論範疇。僅就最有代表性的論詩之言的具體內涵而言，先秦時期的“言志”說尚未進入獨立的詩觀念之中；漢代的“禮義”說雖然在“發乎情”的提法上產生了重要的提示作用，但僅僅著眼於“用詩”的社會功利，因此並不具有詩本體論的實際意義，但詩賴以有別於其他文體的某些本質性因素已經得到了有所側重的關注。魏晉時期以陸機為代表的“緣情”說具有中國詩觀念真正起點的意義（詳論見後文），中國文化中的詩性在文體“詩”的依托中終於有了觀念的表述。此後六朝、隋唐時期的“意象”說、“風骨”說、“吟咏情性”說、“滋味”說、“氣韻”說（蕭子顯）、“興象”說、“詩境”說及“詩味”說等等，大體圍繞著“情本”的觀念而立論，從藝術思維和審美標準的角度對詩的本質特徵進行了深入探討，詩的獨立意義得到了空前的強調，却從

^① 《詩莊嚴論》、《韻光》引文均見曹順慶主編《東方文論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未有人在概念上對“詩”本體做出甚至企圖做出概括。而儒家經學的長期正統地位又使詩以言“志”的價值得到不斷的申明，唐代出現的“諷喻”說、宋代出現的“載道”說、“義理”說等就是“言志”說在更為狹隘意義上的重現；即使在明、清時期的“格調”說、“肌理”說等論調中，也可以讀出“志”重于“情”的意味。同時，“性靈”說、“神韻”說等與正統詩觀念相左的論點也在不同的層次上豐富了詩觀念。在近、現代的中國文論中，詩性仍是討論的焦點。王國維以“感情的產物”、“想象的原質”、“臆挈之感情”為詩歌定性（《屈子文學之精神》），以“境界”為詩性的最高標準（《人間詞話》），進行了中、西詩性論的第一次會通。初期的白話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詩的“白化”，實即語言和意境上的詩性喪失，聞一多、朱自清、戴望舒等人紛紛撰文重申詩的藝術特性。有趣的是，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借助了古典詩性的力量，如聞一多的“新格律詩”論，朱自清關於《詩經》“比興”的新論等。20世紀60年代以後，漢語詩的創作和研討中出現了“新古典主義”的聲音，從臺灣詩人余光中等人的作品，到大陸詩界“整體主義”、“新傳統主義”、“圓明園詩群”、“太極詩”、“象罔”詩等等旗號，用古典詩性抵禦現代的非詩性、借古典詩性印證詩性的永恆是他們不加掩飾的傾向，古、今的詩觀念在詩問中相通。

思想史的歷程告訴我們：如果一個問題成了千古之問，那麼它往往是與人類生存意義相關的、帶有某種終極價值的哲理性思考。老子、王弼問“有”、“無”，莊子、屈原問“天”，東漢至南北朝的中國學人問“神”是否“滅”，古希臘學人問“本原”，哈姆雷特（莎士比亞）問“生存還是毀滅”，克爾愷郭爾問“如何

去生活”，海德格爾問“存在”……莫不如此。假如成了無解之問，此“問”是否具有合理性也就成了“問”中之“問”了。《五燈會元》卷十八載：“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揖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諾諾。”^① 佛法妙義無法以常言道出，“直截一句”之問犯了禪家大忌。圓通所言之“放下著”原自釋迦牟尼昭示梵志捨棄“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之言^②，可見是一種最為徹底的放棄。圓通禪師“看火”的不答之答除了直覺感悟的啓發（可以理解為“火”的明亮、熱度與意義存在的心理聯繫等）之外，似乎也有危險、禁戒的含義——不當如此問。然而“放下著”却難以做到。詩的神秘而又無窮的魅力引誘着代代文士，“直截一句”的解詩者古來不乏其人。《尚書·堯典》的“詩言志”歷來被視為最初的詩定義；《論語·為政》的“思無邪”更是孔子對《詩三百》帶有示範性質的“一言以蔽之”。從中國詩及詩論的發展形態看，“言志”說不能將“詩”與其他文體有效地區分，也容易導致文學與非文學的混淆（後世對“志”的審美闡發另當別論）；而孔子的“直截一句”祇是對詩的某一具體方面的歸納或要求，遠遠不能涵蓋“詩”的主要特徵，甚至也沒有反映出《詩三百》文本中已經具備的“詩”的意義。對於詩的本質性特徵，在卷帙浩繁的中國古代詩論著作中很少有正面表述者（詳見後文）。在現、當代研究者的論著中，不乏對於詩的文體定

① 《五燈會元》，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220頁。

② 見《五燈會元》卷第一《釋迦牟尼佛》。

義。例如 30 年代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就列出了 40 種詩定義，美國詩人卡爾·桑德堡《詩底定義（初型）試擬》中的定義也多達 38 條^①，而實際上莫衷一是的當代“詩定義”遠遠不止于此。其中又有哪一家能夠完全涵蓋“詩”的真實本質？往往僅是略有契合，有些甚至毫無“詩意”，真有些“言語道斷”的意思。無怪乎黃宗羲曾感嘆說：“古人不言詩而有詩，今人多言詩而無詩。”（《金介山詩序》）對於“詩”的真諦而言，“得”即為“失”。以楊萬里《過松源晨飲漆公店》詩為喻：“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錯喜歡。正入萬山圈子裏，一山放出一山攔。”詩論家進入了重巒疊嶂般的闡釋怪圈。對這一問題的觀念“交鋒”似乎永遠無法正面進行。

“詩”是否可以“問”？古代詩論著作中也確有以“問”為題者，如清代郎廷槐、劉大勤發問，王士禎和弟子張篤慶、張實居作答的《詩問》四卷和《詩問續》三卷；清代吳喬《答萬季野詩問》一卷；又如清代陳僅《竹林答問》一卷^②等。但此類書中所問所答也大都為詩史、詩法的内容，罕見類似于文體界定方面的闡述。吳喬《答萬季野詩問》中出現了“詩與文之辨”（《圍爐詩話》中此句作“詩文之界如何”）這樣關乎詩本體特徵的問題，而答案也祇是用比喻性語言籠統地說“體制辭語不同耳”。又如元好問也說到“詩”和“文”的區別：“詩與文，特言語之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③也祇是談到了基本

① 參見吳思敬《詩歌基本原理》，工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 頁。

② 可參見周維德編注《詩問四種》，齊魯出版社 1985 年版。又見《清詩話續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③ 《楊叔能小亨集引》，《遺山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本。